

从传统安全观到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安全观 的演变、成就及世界议程

王明生

内容提要：基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中国的安全观经历了由专注于军事和政治安全的传统安全观，到涵盖经济、文化、环境等更多领域安全的非传统安全观，再发展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变。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科学、发展的安全观，全面、整体、系统的安全观，辩证、包容的安全观，人民至上的安全观，全球视野的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的局限，综合性地考量传统和非传统的多重安全因素，促进了国家安全事业的巨大发展，推动了国家安全能力的全面提升，拓宽了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视野与实践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全球安全倡议则为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的国际安全合作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 传统安全观 非传统安全观 国家安全战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安全倡议 世界议程

作者简介：王明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副教授（北京 邮编：10003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我国公安机关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研究”（编号：19BSH033）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80/j.cnki.ytaq.2024.3.3

文章编号：2096-0484 (2024) 03-0036-19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①，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国家安全和稳定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在面对国内外各种安全威胁时，以科学的安全观为指导来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纵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流派，其安全理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其一为传统安全理论或传统安全观。传统安全观以国家为出发点进行安全考虑，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4版。

将国家作为安全的主体，重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国内秩序的稳定。其二是非传统安全理论或非传统安全观。这一安全观主张，安全的主体不仅限于国家，也包括个人、群体乃至全人类。它在关注国家安全的同时，进一步全面重视个人安全、群体安全、社会安全以及人类安全。随着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利益逐渐增大，安全已不再是简单的国家间零和博弈的对象，而是一个需要各国通过共同合作与努力加以实现的目标。

在我国，曾经存在传统安全观占据主流的时期。当时的安全观是在战争与和平这一时代主题下产生的，因而主要侧重于国家领土完整和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领域。然而，随着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日益丰富，逐渐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个层面。

十年前，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对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的超越和升华，在继承两者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克服了两者的局限性，实现了安全理论向更高层次的飞跃。从那时起，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始引领新时代中国的安全工作。^① 这一新的安全观不仅科学指导和推动我国安全工作的实践探索与能力建设，而且对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自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来，“国家安全学”已发展成为一级交叉学科，其研究范畴不断扩展，实践指导意义日益增强。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学”也面临着进一步深化学理性从而实现“再学科化”的新挑战。

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安全工作实践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破解全球安全困境、推动国际安全合作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全面而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充分展现了中国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积极姿态和责任大国的形象，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传统安全观：战争与和平时代主题下的国家安全观

传统安全观，亦称“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其核心观点是：安全的根本目标在于确保国家的存续与发展，防范外来侵略，同时防止内部颠覆。这种安全观是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时代产物。从新中国成立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在战争与和平时代主题下，中国也曾秉持传统的国家安全观。

在传统安全观中，国家被视为安全的主体，其主要目标是保障政权的巩固与

^① 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全力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安全研究》2024年第1期，第5页。

稳定。在手段上，它侧重于对外战争和对内稳定，表现出明显的“对抗性特征”^①。在内涵上，传统安全观主要强调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主权与领土完整等内容。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传统安全观，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安全观强调军事因素的重要性，将安全问题与军事战略问题几乎等同看待，而这种战略眼光与安全思维在冷战时期达到了顶峰。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遏制与反遏制斗争对新中国的安全及安全观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强大压力，总体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社会主义中国采取了敌视和封锁政策，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这种外部威胁使得中国政府高度注重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坚持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以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国际上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由此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②

冷战时期，中国安全形势的演变深受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深刻影响。彼时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中苏联手对抗美国、中国单独对抗美苏和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相对封闭，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威胁相对较小。在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尖锐对峙。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面临着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因此，坚持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当时的新中国应对外部威胁的必然选择。中国确也有效应对了战争威胁与政权颠覆的风险，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传统安全观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在维持东西方战略平衡、避免大国直接冲突方面发挥了历史作用，但其局限性显而易见。首先，传统安全观是以国家为单元主体进行的安全考量，忽视了社会本身、社会成员乃至人类整体的安全性；其次，传统安全观的视野主要局限于军事和政治安全方面，忽视了经济、生态、文化安全等当时看似次要实则至关重要的方面，从而导致了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能源短缺以及科技发展障碍、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难题等等，进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性民生问题；最后，传统安全观的盛行使得世界各国陷入“安全困境”，尤其是安全话语权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垄断，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安全诉求无法得到保障。

总之，传统安全观无法有效应对中国乃至国际社会面临的日益多元化的安

^① 参见刘跃进：《安全领域“传统”“非传统”相关概念与理论辨析》，《学术论坛》2021年第1期，第45页。

^② 参见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535页。

全威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致力于思索新的国家安全观，努力探索新的国家安全道路。

二、非传统安全观：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 国家安全观的转型与发展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逐渐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的国家安全观从主要关注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逐渐扩展到同样关注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科技和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内涵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入，在此基础上对安全战略进行了相应调整。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深刻的历史远见，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重要论断。^①这一论断不仅准确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也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实施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思想、新观念逐渐涌现，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知也变得更加全面和深入。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也逐渐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使得“非传统安全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②。从纵向看，安全主体也不再局限于国家层面，人们开始将关注焦点从国家安全扩展到个体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以至上升到国际安全、全球安全和人类安全的层面。这一变化反映了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和拓展，也为我们理解和应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安全挑战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在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金融与公共卫生等领域危机事件层出不穷，环境安全、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等问题也接踵而至，众多跨国乃至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议题迫切需要世界各国间的协同合作与共同治理。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逐步转型，社会结构也在经历深刻变革，这导致攸关人民内部利益、社会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矛盾日益凸显，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也变得愈发严峻和突出。面对这些新的安全挑战，中国领导人在缜密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开始积极调整国家安全观念，逐渐实现从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具体表现就是我国新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

从传统安全观到非传统安全观的过渡和调整以及新安全观的形成，是中国国家安全观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这一转变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安全环境变化的深刻理解和对未来安全挑战的前瞻性思考。1997年3月6—8日，东盟地区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4—105页。

^② 参见王宏伟：《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3页。

论坛建立信任措施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多边安全对话会议。中方在此次会议上提出，应尊重各国主权、和平解决争端和采取综合安全的观念。^①同年4月23日，江泽民在访问俄罗斯期间发表了《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的演讲，明确提出了中国维护世界安全的新安全观的基本主张^②，其后发表的《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以对话协商建立信任，通过双、多边协调寻求和平与安全”^③。此后，新安全观在中国的重要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得到了不断重申与发展。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首次全面阐述新安全观的核心价值——互信、互利、平等、合作，揭示了新安全观的核心思想与实质内容，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④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新安全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这标志着中国新安全观的正式形成。^⑤2002年7月31日，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⑥同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⑦。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价值的新安全观的逐渐形成，标志着中国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变化和进步。通过深入分析新安全观的核心内涵可以发现，其主要关注点在于对外关系以及维护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利益，尽管其中融入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综合安全、共同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观的思想，但它主要涉及的仍是非传统的对外安全观和国际安全观，并非完整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⑧它将国家安全的整体重心置于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内安全内容，在国家安全层面显得片面。飞速发展的时代和不断变化的安全形势，呼唤新的更高层次的安全观出现。在这种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

① 参见《东盟地区论坛建立信任措施会议结束》，《人民日报》1997年3月9日，第4版。

② 参见江泽民：《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中国经济网，2007年6月25日，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06/25/t20070625_11932531.shtml [2024-04-26]。

③ 参见《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央视网，2008年12月2日，<https://www.cctv.com/special/903/6/70494.html> [2023-03-19]。

④ 参见江泽民：《推动裁军进程 维护国际安全——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外交部网站，2000年11月7日，http://russiaembassy.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jyh_674906/200011/t20001107_7944067.shtml [2024-04-20]。

⑤ 参见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第2版。

⑥ 参见《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中国外交部网站，2002年8月1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_673085/zjzg_673183/yzs_673193/dqzz_673197/dmdqqt_673269/xgxc_673275/200208/t20020801_7492616.shtml [2024-04-20]。

⑦ 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第1版。

⑧ 参见刘跃进：《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第11页。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新时代中国安全观的提出与成就

2012年10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新时代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环境，习近平于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深刻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①可见，我国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已不再是单纯的对外安全，而是涵盖了更为广泛的内外安全领域，展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的特征。这一安全认知的转变，不仅体现了中国国家安全理念的深化与拓展，也为我国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工作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科学遵循。

（一）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

新时代背景下，在“两个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织影响下，中国的国家安全事业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已发生深刻变革。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以全新的指导思想引领国家安全事业的实践和发展。

1. 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动因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的国家安全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国际秩序的失范风险愈发凸显。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当今世界的共同挑战与发展需求时显得力不从心，治理失灵的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大国间的战略博弈日益加剧。近年来，主要国际力量格局处于深度调整与再平衡的过程中，国家间的共同利益逐渐被竞争性利益乃至排他性利益所替代，单边主义思潮泛起，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不断升级。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社会结构也在经历深刻变革，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导致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变得愈发严峻和突出。面对新时代严峻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我国迫切需要转变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发展重于安全”的安全观念，将其调整为“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国家安全战略，而总体国家安全观凸显了发展与安全的统一和并重。

“发展和安全并重”的安全战略观念，体现了对发展与安全关系更为全面、

^①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00—201页。

辩证的认识。一方面,中国依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需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日益加剧,中国面临的风险挑战更为复杂化、多元化。因此,必须把维护安全和推动发展贯穿于国家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切实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国内安全环境。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顺应了国际安全大势和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超越了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的局限,标志着中国的安全理念和安全战略在新时代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2. 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以往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的提升

与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相比,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了前两者的局限,实现了对两者的整合与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科学、发展的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首先是科学、发展的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安全概念,它内涵丰富,可归纳为“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五大要素,指的是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社会文化安全和国际安全五大要素。其中,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这五大要素,清晰反映了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关系。五对关系,指的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五对关系,准确反映了辩证、全面、系统的国家安全理念,是对传统安全理念的超越。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内涵,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安全形势的实际需要,总体国家安全观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国家安全法》,将总体国家安全观写入其中。^②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明确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这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进一步完善。^③2020年12月11日,习近平在主

^① 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23页。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4日,第15版。

^③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7、20页。

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又提出了“十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①这不仅标志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已经形成，更显示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成熟定型。总体国家安全观历经十年的发展，其内涵不断丰富，实践不断深入，已成为指导中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核心理念和行动指南。

(2) 全面、整体、系统的安全观

相较于传统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高度的全面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实现了多项安全的统筹规划。^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全面性，体现在其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全方位考虑和应对策略，旨在构建一个科学完善的国家安全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体现了其整体性特点。它要求从整体和宏观的视角来全面审视国家安全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总体国家安全看作是各种类型国家安全的简单堆砌，更不能用线性思维去片面理解它。^③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还具有显著的系统性。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国家安全是一个层次分明、结构清晰的系统，是全面和深化了的理论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并非简单的综合或复合的概念，而是一种更为全面、深入的整合性国家安全理念。它具备高瞻远瞩的视野，为构建健全的国家安全体制和法制体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战略指导，有助于我国提升安全危机应对能力，成功应对愈发复杂、系统的国家安全挑战。

(3) 辩证、包容的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以往的两种安全观相比，体现了辩证、包容的特点。从辩证的角度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了思想方法上的辩证思维，更加注重内外安全的有机结合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还展现出开放包容、放眼全球的性质。^④这种包容性在多个方面得以展现：首先，从其理论来源的角度看，它具有广泛性。通过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深刻总结凝练了百年来我们党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精华，同时还吸纳了国外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宝贵经验。^⑤

① 参见《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3日，第1版。

② 参见刘跃进：《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第17页。

③ 参见曹诗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人民日报》2022年8月5日，第11版。

④ 参见傅小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建构、实践探索与世界意义》，《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2期，第10页。

⑤ 参见曲洛松、彭春淋、旷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厚文明底蕴》，人民网，2024年4月8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4/0408/c40531-40211283.html?ivk_sa=1024320u [2024-04-26]。

这种多元融合与提炼，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得以构建，标志着中国在国家安全理论探索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跨越。其次，从国家安全理论体系的深邃与开阔思想境界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已然摒弃了过往那种“内向自顾”的局限观念，转而积极拥抱一种“共赢开放”的新型安全理念，体现了以共同安全确保自身安全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①

(4) 人民至上的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保障人民安全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国家安全工作应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② 它突出了人民在国家安全中的主体地位，将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作为国家安全的根本标准。这种安全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③ 的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④ 的原则，找到了国家安全的最终归宿。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维护国家安全不仅是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更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活幸福。

(5) 全球视野的安全观

在全球政治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致力于构筑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强调命运共同体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深刻反映了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有机统一的整体，体现了现代国际关系的新理念。中国还进一步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安全治理理念，倡导“多边主义，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推动各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⑤ 习近平多次论及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问题，强调国家安全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既要关注本国的安全，又要重视共同安全。这实际上是以大国元首的身份提出国家安全在国际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⑥ 这表明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了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理论，具有更广泛的全球视野和更深远的世界意义。

(二)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年来的主要成就

经过十年的发展和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方面有力推动了国家安全工作的实践探索和能力建设，另一方面促进和丰富了中国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建构和

① 参见曹达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四重内涵》，人民网，2017年6月2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628/c40531-29367349.html> [2024-04-26]。

② 参见《习近平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强调 牢固树立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开创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7年2月18日，第1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④ 《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9页。

⑤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4月27日，第3版。

⑥ 参见程同顺：《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和特色》，《人民论坛》2017年第29期，第37页。

学科发展。

1. 有力推动国家安全工作的实践探索与能力建设

十年来，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工作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力推动国家安全工作能力建设，并与国家安全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取得了共同进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指引下，国家安全事业得以稳步前行，国家安全治理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

在过去的十年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时”与“势”进行了科学分析，辩证地处理了“危机”与“机遇”的关系，成功开辟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步完善，在促进国际共同安全的进程中，我们展现出了更加自信且主动的姿态，开创了通过构建新安全格局来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新篇章。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虑和布局。通过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提高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能力，可以有效提升我国的国家安全能力，更好地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和挑战。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和任务进行了全面部署，将国家安全工作作为独立篇章深入阐述，明确提出了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以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通过新安全格局来保障新发展格局，不仅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内涵，更为其探索和实践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中国密切关注国内外安全形势的演变，深化国家安全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的应用。针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新趋势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新需求，中国积极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构建现代化的国家安全能力体系，实现主动塑造安全环境、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及高效管控国家危机的有机整合，确保国家的安全稳定和社会的平稳发展。十年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水平和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1) 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体系

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不仅要从政治高度去认识其重要性，更要从实践层面去体会其深远影响。这一原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要求，更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石。2014年，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审时度势，做出了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更彰显了党对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定决心。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实现了国家安全工作从分散到集中、从迟缓到高效、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提高了国家安全工作的整体效能，也极大增强了国家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戰的能力。

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国家安全法为引领，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香港国安法等 20 余部国家安全专门立法接连出台，110

余部含有国家安全条款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修订。^①此外，中共中央还颁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条例》等重要党内法规，通过制度建设和法治保障，进一步强化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2)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体制机制建设

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②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的成熟完善，确保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得以切实实施，从而为构建国家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机制奠定坚实基础。从风险与危机的演变过程来看，风险可视为危机的“过去形态”，而危机则是风险的“未来形态”。为了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必须提前规划，将管理环节拓展至风险管理层面，对国家安全风险进行持续监测与评估，并基于这些评估结果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当前世界纷繁复杂，诸多难以预料的事件及其效应层出不穷，预警机制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防止临界性事件的发生。^③

(3) 有效提升国家安全发展的推动能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发展的基石在于安全，积极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有效提升了国家安全发展的推动能力。“过去的十年，我国持续深化‘六稳’工作，并全面推行‘六保’任务，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与效益，并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安全因素，确保稳健可持续的发展。”^④在应对 2020 年初暴发的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统筹疫情防控与社会经济发展，有效地遏制了疫情蔓延，并以此为契机迅速恢复了生产和工作的正常秩序，率先实现了经济的正向增长。与此同时，坚决捍卫粮食安全和资源能源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构筑了坚实稳固的资源保障。^⑤中国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这些举措的实施，不仅推动了我国发展工作与安全工作的相互促进，也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

2. 促进和丰富了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发展

从理论建构的视角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发展，是在习近平新时

① 参见张璁：《筑牢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法治保障》，《人民日报》2023 年 7 月 6 日，第 19 版。

② 参见曹海军：《新时代国家安全视域下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社会科学辑刊》2023 年第 4 期，第 104 页。

③ 参见王宏伟：《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社会治理》2015 年第 4 期，第 130 页。

④ 参见傅小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建构、实践探索与世界意义》，《国际安全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14 页。

⑤ 参见张晓晶、曲永义、林桂军等：《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选择》，《国际经济评论》2023 年第 4 期，第 27、37 页。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针对国内外安全形势的新变化、新挑战做出战略选择和战略判断。它不仅是对中国以往国家安全观念的超越和提升，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的现代诠释和发展。在过去的十年里，党和政府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推动了国家安全思想、制度和学科体系的创新，还设立了“国家安全学”这一一级学科，全面而系统地回应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时代课题，通过理论建构来推动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发展，以更好地应对当代中国的安全挑战和威胁。

(1) 明确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了国家安全的全面性、整体性和系统性，有力地推动了国家安全学由单一领域向多领域、多层次的全面发展，并为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学术指引。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核心宗旨，在于满足国家战略需求，通过构建新的安全格局来确保国家新发展格局的稳固。这一宗旨也为我们明确了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体系的重点领域、方向和范畴，为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方向。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引领下，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回顾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来的这十年，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已经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格局。这个格局着重于全面剖析总体国家安全观，进一步加深对国家安全学及其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深度，同时致力于构建融入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安全学的理论研究不仅在深度上取得了明显进步，更在加强学科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向更高层次的发展。^①

(2) 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极大促进了国家安全学学科领域的快速成长与深化。国家安全学不仅在学术层面上进行了系统的整合与创新，也在实践应用层面得到了广泛的拓展。其中，国家安全术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是这一阶段的重点工作之一，通过明确界定各类国家安全概念，确保了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准确理解和有效沟通。特别是在国家做出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决定后，教育部门和学术界进一步加大了对该学科的支持力度，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开展了大量的前沿课题研究，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涵盖国家安全战略、管理、教育、技术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跨学科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从而逐

^① 参见李文良：《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十年回眸》，《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2期，第52页。

渐形成了系统完善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①

自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构建多维度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以来，中国学界的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断得到夯实，包括国家安全的本质、构成要素、功能机制、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领域国家安全学与工具国家安全学等理论的研究进入新阶段。领域国家安全学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多个领域，是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领域知识体系的全面、系统的认识。工具国家安全学理论可以被视为中国学界对于国家安全领域中具有工具性特征的各个方面，如战略、治理（管理）、法治、制度、体制机制和技术等进行的系统化认识。这些都为建立一套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②

通过对当前领域国家安全学理论和工具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细致审视，可以发现其理论研究常常遵循固定结构模式，即问题或挑战、原因分析及应对策略。为了克服这一局限，研究的重心开始转向对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的深入挖掘，这一转变凸显了国家安全学作为学科体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涵盖了丰富的概念术语、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有助于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进一步巩固和深化。

2020 年 12 月，中国正式将交叉学科门类纳入教育体系，并将“国家安全学”列为其中的一级学科，对其学科性质进行了明确界定，并为其赋予学科代码 1402。^③ 这一举措不仅凸显了国家安全学的交叉学科属性，更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明确的指引。目前，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势头强劲，学科体系日益完善，学术体系不断深化，话语体系也愈发丰富，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在理论研究方面，针对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提出了诸多新观点新论断，为我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方向，应以深化探索基础研究范式为主导，并充分利用其固有的交叉性、战略性和政治性特点实现突破。首先，就学科的交叉性而言，应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强化多学科间的协作与配合，共同应对国家面临的重大安全挑战。其次，不能忽视学科的战略性的特点，应深入领会并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性和指导性，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为学科建设提供坚实支撑。最后，在学科的政治属性方面，应立足政治安全，强化政治意识和底线思

① 参见刘跃进：《对国家安全学学科门类合理化定位的思考》，《情报杂志》2019 年第 2 期，第 2 页。

② 参见李文良：《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十年回眸》，《国际安全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57—58 页。

③ 参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中国教育部网站，2021 年 1 月 13 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yjss_xwgl/xwgl_xwsw/202101/t20210113_509633.html [2024-04-20]。

维，合理布局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其中，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必须紧密围绕政治安全展开，确保国家安全学学科发展始终与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紧密相连。

四、全球化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议程

当今世界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安全视野拓展到国际安全、全球安全乃至人类安全，体现了世界眼光和全球战略思想。近年来，习近平相继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系列倡议。这些理念和倡议的提出，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全球安全，具有重要的普遍价值和世界意义。

面对急剧动荡、有着失序风险的人类社会，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安全合作”^①。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处理好国家安全时代特性和国际社会普遍安全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处理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问题；^② 国家安全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而全球安全倡议则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目标有了更加具体而明确的可操作方案，也使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议程更加明晰。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议程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③ 这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议程，是为以往的国家安全理念注入新的中国智慧，反映了中国对于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如何平衡推动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如何应对并引领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时代性议题等的探索方向。

1. 为传统的全球治理注入新智慧

国家安全与国家相伴相生，其理念的发展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进。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5版。

② 参见王鑫：《百年变局之变、历史启示及中国的战略选择》，《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1期，第17页。

③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04页。

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视角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理念,并明确指出:“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①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深具影响的国际理念正式写入联合国的决议中,显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传统的全球治理带来了创新性的中国智慧。这一理念超越了零和博弈和狭隘的国家中心主义,主张世界各国应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共同应对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如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冲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在内的各类全球性挑战。具体来说,中国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注重内外兼顾、综合施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合作与改革,强调国际合作与多边机制的重要性,以实现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如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秉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迅速公开疫情信息,加强国际合作,向全球分享疫情防控经验,提供物资和技术援助,充分展现了中国对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解和有效应对。

2. 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新视角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视野,全球视野的安全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体现。它着重强调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倡导通过合作与对话解决国际争端和问题,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其一,强调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东亚峰会为例,各国领导人在此平台上共同讨论地区安全问题,有助于东亚各国超越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关系。其二,倡导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这有助于避免国家间战争和冲突的发生,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从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其三,强调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的重要性。世界各国在关注传统安全问题如军事和政治安全的同时,也要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问题。通过全面、系统地考虑各种安全威胁,并采取综合性的措施加以应对,可以更好地保障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3. 为人类未来图景树立新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63页。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它倡导全球各国同呼吸、共命运，着重强调开放性与包容性、公平与正义，推崇和谐相处、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借鉴，以及紧密的团结与协作，提出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五位一体”建设为总体框架，体现了对历史视野的再拓展和思想内涵的再深化，为人类未来锚定了更明确的目标，描绘了更清晰的图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超越了局限性的国家利益纷争与地域文化分歧，它以命运共同体为基石，秉持共同的价值观，尊重并包容文化的多元性。通过世界各国人民的通力合作与共同治理，携手合作以达成人类社会的安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

（二）全球安全倡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国际共同安全实践路径

当今世界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的和平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和治理赤字愈发凸显，国际安全形势愈发错综复杂。当前，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国际社会共同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和协作。构建安全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务之急，没有安全、没有持久的安全，就没有人民福祉，就没有世界和平发展，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前途。在2022年4月21日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在主题发言中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①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继“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之后，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和生动实践。伟大的时代呼唤着宏大的格局，而宏大的格局又需要宽广的胸怀作为支撑。面对“世界应秉持何种安全理念、各国如何共同保障安全”这一时代的重大命题，习近平以大国领袖的卓越智慧与深邃思考，敏锐地洞察国际局势的演变，积极探求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世界安全问题提供新的解答思路。^② 全球安全倡议凝练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核心思想与主张的精华，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于构建普遍安全世界的热切期待。

全球安全倡议不仅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际安全领域的自然延伸，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追求国际共同安全目标上的具体呈现。它不仅着眼于现阶段人类安全所面临的紧迫性挑战，更从全球安全治理的长远视角出发，寻求维护世界和平的长久之道；^③ 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安全问题的深刻思考，也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全世界共同构建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提供了

^① 参见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第2版。

^② 参见徐步、陈文兵：《全球安全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宁指明方向》，《当代世界》2022年第5期，第21页。

^③ 参见王志民、岑英武：《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进路》，《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第85页。

新的实践路径。2023 年 2 月 21 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从背景、核心理念与原则出发，进一步阐述了中方在全球安全倡议的框架下开展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的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以及合作平台和机制。^①

1. 核心理念和原则：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详细阐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和实践主张。全球安全倡议着重强调了“六个坚持”的深远内涵，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② 全球安全倡议将中国国家安全与大国外交理念进行“两个结合”，以国内发展与国际安全“两个大局”为立足点，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想”相融合，同时全面考虑和平与发展“两件大事”，并内在包含了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两大目标”的基本特征。^③

2. 重点合作方向：互补互促国际安全合作

全球安全倡议明确提出，在倡议框架下开展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的双多边安全合作，积极推进安全理念对接和利益共融，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第 59 次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在“中国专场”发表了主旨讲话。他强调，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更是时代前进发展的正确方向。为了世界更安全，各国要回归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为解决全球安全难题提供更系统的思路，更可行的举措。^④

针对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给出了二十条具体方案。在实践中，中国身体力行，始终坚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通过劝和促谈的方式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致力于维护全球的安全与稳定。当前，乌克兰危机仍在持续，巴以冲突愈演愈烈，朝韩对立日益加剧。全球安全倡议为有效破解全球安全困境，提出了明确的“路线图”。全面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对于推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解决巴以冲突，缓和朝鲜半岛的对立局势，维护

① 参见《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人民日报》2023 年 2 月 22 日，第 15 版。

② 同上。

③ 参见吴凡：《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逻辑、基本特征与实践路径》，《社会主义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150—151 页。

④ 参见王毅：《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中国外交部网站，2023 年 2 月 18 日，http://russiaembassy.fmprc.gov.cn/wjlb_673085/zjzg_673183/xws_674681/xgxw_674683/202302/t20230218_11027033.shtml [2024-04-13]。

世界和平与安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全球安全倡议以捍卫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安全为出发点，强调世界各国安全紧密相连，倡导以相对安全理念取代绝对安全理念，以共同安全理念替代独享安全观念，推动世界各国团结合作，互补互促，以实现长治久安，构建一个公平、正义且共建、共享的全球安全环境。

3. 合作平台和机制：利用国际组织机制汇聚应对安全挑战共识

当前，国际安全格局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变革不仅冲击了原有的全球与地区安全框架，更为创新性地构建新的安全架构提供了契机。然而，新安全架构的建设及其界定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必将充满竞争与挑战。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打破国际安全互动的结构性桎梏，开创崭新的互动契机，并以创新的活力和战略性表述引领国际社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它以问题为导向，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既明确阐述了对普遍安全议题的立场与承诺，又凸显了对地区安全热点问题的深切关注。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利用联合国及其他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等平台，发挥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等相关机制作用，通过充分利用或规划、创设新的诸如全球性安全论坛合作机制与平台，期望促进世界各国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世界。

4. 中国推进国际安全的实践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一直致力于构建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其具体实践有：

(1) 注重践行国际安全合作价值

自2022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以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表示支持，近70个国家加入了“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①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和挑战时，我国积极倡导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并推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地区和全球合作倡议和方案。通过推动务实合作措施的落实，我国以实际行动回应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需求，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2) 维护国家利益，冷静处理争端

近年来，在南海、台湾等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在严正申明自己的立场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尽力寻求以对话沟通的方式缓解紧张、消除矛盾、避免冲突，很好地落实了全球安全倡议，维护了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① 参见王毅：《胸怀天下，勇毅前行 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华章》，《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6日，第15版。

(3) 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中国在和其他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同时,主动参与全球安全问题的处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2023年3月10日,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沙特和伊朗这两个曾经长期对立的国家在北京达成和解并同意复交,并赞赏和感谢中国领导人和政府的推动。^①这一“世纪和解”既是对话与和平的胜利,也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好诠释。在俄乌局势和巴以冲突日趋紧张之际,中国始终坚定地站在和平的立场上,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审视整个事件,坚决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推动和平对话与谈判,反对任何可能激化矛盾的行为,致力于防止冲突升级和人道主义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努力构建欧洲与亚欧大陆持久和平的稳定架构,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贡献中国力量。

五、结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处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之中。此刻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这一历史进程既充满了希望和潜力,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妥善平衡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积极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

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更有力的行动,不断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向前发展。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不断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提高国家安全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还要加强国家安全和宣传,增强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成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同时,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安全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应当全面强化自身国家安全并努力维护国际安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提供坚实可靠的安全保障。

(收稿日期:2024-04-07,责任编辑:林昶)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三方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3年3月11日,第7版。

Abstracts

Diplomatic Self-confidence: Logics and Policies of China in its Foreign Affairs

/ *Li Kaisheng* / 1

Self-confidence is a key word in understanding China's diplomacy and its practice. The quality of self-confidence could be perceived in either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y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49 or evaluating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China's policy papers. The principle of self-confidence is composed of four pillars: faith in "the four matters of confidence", based on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aiming at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and approaches of strategic and historical self-confidence. Self-confidence has come into the field of China's diplomacy because of four deep logics which has been internalized into the governance thinking of CPC: dialectics, macro-history, subjectivity and evolutionism. China's foreign policy based on self-confidence has played the positive important roles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hieving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civilization co-existence in the world while facing the tough challenges. Thus, i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it is the critical to interact with the world more effectively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self-confidence.

Keywords: China's diplomacy; self-confidence; strategic self-confidence; foreign principle; foreign policies

The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st, Pres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Strategy

/ *Shi Yinhong* / 19

Over the past 15 years, the primary characteristic of China US relations has been game rather than coordination. The gam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egins on the strategic front, and then unfolds on the four main fronts of strategy, economy and trade, high-tech, and ideology.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a "defensive" strategic posture. The United States believes that its significant advantageous position over the long term has been lost and eroded one after another, with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 on China's sid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 has gradually become a rapidly rising strong country. The greatly enhanced national strength has strengthened China's confidence and aspirations. China is making effort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o participate or even take a leading role in certain areas of world politics, economy, and global governance, achieving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advantages in the Asian continent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roughly gaining strategic and military advantage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Furthermore, the ability to control the strategic space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island chains is increasingly seen as necessary. Reviewing the posture and policies of the three administrations of Obama, Trump and Biden towards China, we should be prepared for possible storms in the futur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Keywords: China US relationship; China US game; strategic game; Chinese strategy; Asia Pacific region; South China Sea

Transitioning from a Traditional to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An Analysis of China's Security Perspective Evolution, Accomplishments, and the Global Agenda

/ *Wang Mingsheng* / 36

Contextualized by the particular chronology of its historical eras and the fabric of its societal milieu, China's conceptualization of security has traversed an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This passage has seen a marked transition from a conventional outlook underscored by military and political defensibility to an all-encompassing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ramework, integrating facets of economic,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It has culminated in the embodi-

ment of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reflecting a philosophy that is both scientific in its advancement and developmental in nature. This doctrine espouses a vision of security that is holistic, integrative, and systematic, maintaining a dialectic and inclusive stance, premised upon the supremacy of the people’s welfare, and suffused with a perspective that is unreservedly global in scope.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surpasses the constraints of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outlooks by integrating a multiplicity of both conventional and avant-garde security elements. This integration has precipitated monumental developments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enterprise and has catalyzed a holistic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capabilities. Furthermore, it has expanded the horizon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with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philosophy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ortifies the global discourse of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contributing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to international dialogues. Concurrently,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provides a beac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llaborative, holistic, 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Keywords: security outlook;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traditional security outlook;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outlook;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Global Agenda

“Monopoly” and “Sharing”: Divergences of U. S.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 in Asia and Europe / *Gu Quan* / 55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 has been the basic me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build and maintain alliances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present. But its modes of operation can be wide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regions. Since the late 1950s, the United States has gradually built up a “nuclear sharing” mechanism within NATO to address the “credibility” problem of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 in Europe. In contrast,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n East Asia, the U. S. has not introduced a similar program to its two major allies, namely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continued to adhere to the “nuclear monopoly” model.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the larger power gap between East Asian all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the lack of major crisis events during the critical periods” are the two main factors preventing the U. S. –Japan and U. S. –South Korea alliances from reaching “nuclear sharing” of NATO style. Of these, the effect of the former factor is more decisive. In addition, the U. S. withdrawal of all land-based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from East Asia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ompletely eliminated the opportunity for Japan and South Korea to pursue “nuclear sharing.” Nevertheles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and regional change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U. S. would significantly change the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 mode in East Asia cannot be completely ruled out.

Keywords: U. S. ; US–Japan alliance; US–ROK alliance; European allies;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 nuclear monopoly; nuclear sharing

A Review of the Revision, Improvement and Application Perspective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 *Gao Han* / 73

On the occas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its formal implementation,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has undergone its second comprehensive revision in 2023. The revision constitutes a comprehensive effort to address the problematic issues existing in the law and at the same time incorporating a wide range of consideration of and practice on China’s efforts in becoming a maritime power and its commitment to the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 number of important revisions have been made,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to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Law, expanding of the scope of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clause, creatively enriching the provisions on marin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other clauses, and active responding to international maritime governance issues. It needs to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also requires necessary support by other relevant laws and reg-